

Study on Company Political Strategy:

Concep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erformance

企业政治战略：

影响因素及与绩效关系研究

许小君 / 著

绵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绵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013033309

F270
2411

Study on Company Political Strategy:
Concep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erformance

企业政治战略

影响因素及与绩效关系研究

许小君 / 著



北航

C1639588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F270
2411

00333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企业政治战略: 影响因素及与绩效关系研究 / 许小君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643-2083-6

I. ①企… II. ①许… III. ①企业管理 - 战略管理
IV. ①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9222 号

Qiye Zhengzhi Zhanlüe: Yingxiang Yinsu ji yu Jixiao Guanxi Yanjiu

企业政治战略: 影响因素及与绩效关系研究

许小君 著

责任编辑	祁素玲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川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7.687 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083-6
定 价	2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随着政府对企业影响的日益广泛和相关利益群体力量的崛起,企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如何应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何通过对政治环境的管理,维持现有地位或者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提高社会对企业的认同,成为企业、政府、消费者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相关利益群体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因为政治环境对企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很多企业都专门设置公共事务部门来管理企业与政府、媒体以及其他公共团体之间的关系,企业政治活动上的投入不再被看作是企业的成本约束,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企业政治活动的决策也如市场决策一样,可以以价值为导向,并且能够创造竞争优势或者弥补竞争劣势。因此,本研究从战略的高度,以价值创造为线索来重新诠释企业政治活动,并建立系统的理论框架。

第1章是绪论部分。本章在对企业实践活动的变化进行分析和对当前国内外研究进行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要研究的问题,明确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介绍研究方法,明晰技术路线和结构框架。

第2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本章分别对国内和国外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内容包括:①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三个理论视角对国外研究进行总结梳理;②以研究内容为线索对国内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论。研究回顾的目的不仅是帮助本研究确立研究主题和内容,也可为本研究选择有解释力的理论视角指明方向。因此,既往研究的回顾指出了厘清相关概念和构建系统理论框架的必要性,进一步明确了研究主题。同时指出,相对于经济学视角而言,

管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在解释企业采取政治战略的决策、分析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等方面更有优势，因而本研究将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动态能力理论作为建立系统理论框架的主要理论基础。

第3章为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本章在研究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把企业政治战略的前因和后果统在一个理论框架之中，具体来说，就是构建了一个概念和两个理论模型。一个概念是指企业政治战略，两个模型是指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企业政治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依据制度理论和在资源基础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动态能力理论，从动机和反应方式两个维度，明晰了企业政治战略概念的内涵，廓清了概念的外延，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政治战略进行分类。

(2) 从宏观的地域层面、中观的行业层面和微观的企业层面综合探究影响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的因素，旨在重新认识这些因素对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层理论框架。

(3) 引入在资源基础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态能力观，强调了与政治战略有效性相关的企业特有内部流程和能力的作用，构建理论模型深入揭示企业政治战略与经济绩效和合法性之间的关系。

第4章进行研究设计。本章详细报告了问卷的设计过程和主要内容、量表设计依据和测量的指标来源、样本选择依据和问卷回收过程，运用 SPSS 软件对问卷进行了样本特征和分布分析、项目分析、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

第5章进行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本章运用 AMOS 软件、HLM 软件和 SPSS 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多层线性回归、层级回归等统计方法对第3章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验证了企业政治战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接着通过多层线性回归的统计方法，综合探究地域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因素对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的影响；然后，再运用层级回归方法，

检验了动态能力对企业政治战略和绩效之间关系所起作用的显著性。

第6章提出了研究结论、研究启示和研究展望。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本章获得了以下结论:①企业政治战略可以分为反应型政治战略、预期型政治战略、防御型政治战略和前瞻型政治战略。②企业的性质、历史、规模、资本结构、股权结构、组织冗余和多元化程度均能影响企业政治战略决策,但是以上提到的企业资源基础特征和企业政治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在行业层面有一定程度的变异,该变异程度受到行业制度环境的影响;行业制度环境影响了企业资源基础特征和政治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地域层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异,其变异程度受到地域制度环境的影响。本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理论中的观点。③企业政治战略对经济绩效和合法性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动态能力的影响,即企业要通过政治战略获得竞争优势并且提高经济绩效,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企业动态能力。该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即企业政治战略的应用是与企业资源基础相适应的。

本研究创新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与既往研究单一地从某一个理论视角出发不同的是,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视角整合的观念一直贯穿本研究始终。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如下观点:企业政治战略是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企业政治战略决策不仅受到资源基础的影响,而且受到行业制度和地域制度环境制约;企业政治战略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动态能力。

(1)本研究突破了资源基础观视角的旧有研究范式和仅从企业内部出发的原子主义观点,在企业资源基础特征和企业政治战略决策之间关系无一致性结论的背景下,结合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引入行业层面因素和制度层面因素,建立多层理论模型来全面探讨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的影响因素。并且采用能处理复杂嵌套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运用HLM软件,从技术上实现对个体效应、行业群



体效应和地域群体效应的分离。

(2) 既往研究大多基于单一维度的程度变化对企业政治战略进行分类, 这种分类方式并没有完整把握战略的本质属性。本研究创新性地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整合的视角构建多维度的政治战略概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选择了动机和反应方式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的提出分别基于制度理论和在资源基础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动态能力理论, 其中, 动态能力理论对于企业动机的解释——企业设法创造价值或者维护已有价值, 以获得或维护一种竞争优势——成为本研究在动机这个维度上找寻企业政治战略本质属性的理论基础; 而制度理论认为企业对于外部制度、规制变化的反应可以分为顺从和影响,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 这又为本研究从行为反应的维度找寻企业政治战略本质属性提供了另一个理论背景。两个视角的融合构建了一个二维概念空间。

(3) 在“资源→战略→绩效”研究思路指导下的既往研究无法回答“为什么采取同样政治战略的企业却没有获得同样效果”的问题, 没有揭示企业政治战略与绩效之间关系的“黑箱”。本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思路, 引入在资源基础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力观, 系统构建并实证检验了“不同动态能力→企业政治战略与绩效、合法性的关系”的分析模型, 实现了能力和战略在绩效影响因素中的融合分析, 也为权变地分析企业政治战略和绩效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新颖的研究思路。

本研究为企业政治战略管理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交流的平台, 为从企业内部探究企业政治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做了有益的探索, 实现了对企业政治战略问题的多维度透视, 可作为相关研究者的参考资料。

作 者

2012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问题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4
第四节 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16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	19
第一节 国外研究回顾	19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34
第三节 研究综合述评	38
第四节 本章小结	46
第三章 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	48
第一节 企业政治战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49
第二节 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基于反应方式单一维度的分析	70
第三节 企业政治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内在机理和理论模型 ——基于反应方式和动机两个维度的分析	9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13
第四章 研究设计	115
第一节 构念测量	115
第二节 问卷设计	125

第三节	数据收集和样本分布	126
第四节	分析工具	132
第五节	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	133
第六节	效度分析	137
第七节	本章小结	143
第五章	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	145
第一节	企业政治战略概念的实证检验	145
第二节	企业政治战略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51
第三节	企业政治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的实证分析	17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85
第六章	研究结论、研究启示和研究展望	187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87
第二节	研究启示	191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194
附录	我国企业政治战略调查问卷	197
参考文献		204
后 记		23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问题提出

一、选题背景

(一) 现实背景

1. 政府对企业的影晌日益广泛

企业对政府的资源依赖广泛存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非市场体系（如政府控制和社会网络等）获取资源（Stephen et al, 2002; Nee et al, 2003; Peng, 2003），对于处在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政府制定并执行各种经济和商业政策，并依靠行政权力保持着对土地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一个组织对其他组织的依赖程度与这个组织对其所依赖的其他组织所提供的资源或服务的需要成正比（Thompson, 1958）。因此，如果政府掌控的资源对企业来说十分重要，并且企业很难找到可替代资源，那么政府就对企业拥有了非常大的权力，企业的自主性将受到约束。为了应对这种约束，企业需要通过政治活动来影



响政府的相关政策，从而创造有利于其发展的制度环境。

政府对企业的规制理念和手段不断更新。政府规制在市场经济国家由来已久。美国在 1916 年就迎来第一个管制高峰期；1929 至 1933 年大危机之后进入大规模的规制高潮期；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进入大规模的放松规制浪潮期；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又出现再规制的动向，形成当代的再规制与放松规制并存期。与管制程度波动起伏的历史演变轨迹相对应的是管制手段的发展：环境规制、生产和工作场所安全规制、医药产业价格和进入规制、金融信息披露规制等社会性规制手段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规制水平和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仅运用市场准入限制、价格规制、数量限制等方式直接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全面、深入地干预，而且逐步运用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社会规制措施和手段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中国政府规制面临着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强经济规制及其相应的行政性垄断向有关产业旧体制内行政垂直管理的规制放松与新兴市场发育所需要的规制重构转换，从缺乏法律基础的弱社会性规制向建立在完善法律基础上的强社会性规制转换。因此，中国企业必须深刻领悟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以及规制方式的转换，寻求与这些变革适宜的应对方式。

政府成为企业的重要客户。政府从企业购买物质和服务已经成为国际趋势。据统计，在 1978 至 1979 年间，欧美发达国家私营公司与政府以合同方式承包的社会服务分别占全部社会服务的 35% 和 8%。中国财政部于 1999 年 4 月颁布了第一部有关政府采购的全国性部门规章《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到 2000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颁布了地区性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政府采购法也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政府采购的相关机构和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其采购范围和规模迅速扩大。政府逐渐成为企业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客户。

政府对企业的影晌是如此广泛，迫使企业不得不关注政治环境变化对其带来的影响。

2. 影响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其他力量的崛起

西方国家大多是市民社会，强调“社会参与”，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的出台一直是各种利益集团权力斗争和利益平衡的结果（高勇强，2004），企业通过其政治行为“俘获”政治进程，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经营环境。消费者保护主义的抬头、环保等第三组织力量的崛起、劳工谈判力量的增强，等等，构成了西方国家政治进程中复杂图景，也改变着各方力量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度和方向。

而我国更强调“国家意志”，国家掌握着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和结构性活动空间，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企业对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正式影响途径会受到诸多限制。但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法律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不是一句空洞的、抽象的话语，而是切实要求在民主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人民的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努力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这意味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会让更多的群体、更多公众通过民主方式参与到立法过程当中来：那些与某项政策利益攸关的利益群体力量的增强会影响到制度和政策走向，如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已经引起消费者团体的广泛关注，他们对食品安全要求立法的呼声推进了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的进程；“科学立法”的宗旨要求政策制定进程必须有更多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学者和精英的参与，这些学者和精英的参与规范了法律法规制定的进程，也使得政策变动背后隐含的利益分配过程更加凸显社会公平的准则；媒体的迅猛发展开辟了更多民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发出呼声的渠道，从而影响了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制定初期对问题的感知。这说明其他群体力量的增强，促使企业超越对政治环境的狭隘理解，站在更高的平台，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和应对政治环境的变化。

3. 企业政治活动的兴起

早在 1969 年，Epstein 就认为“企业的政治竞争紧跟市场竞争

的浪潮”，政府被看作是一种可以为企业创造有利环境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日益加强的政府管制相呼应，企业政治活动在西方国家大量涌现：如MCI就成功运用了政治战略，说服美国政府解除对于长途电话市场的管制（Yoffie et al, 1985）；当百事可乐在法国、美国、印度等市场受到挫折后，转为求助于政府以重新占领被掠夺的市场；美国的钢铁企业通过游说政府提高行业进入壁垒，在一个下滑的市场坐享稳定的价格和利润（Schuler, 1996）；摩托罗拉自进入中国以来，最重要的企业战略之一就是构筑良好的政府关系，其公开发布的中国市场发展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双赢、扎根中国和做社会好公民，同时，它还切实通过积极游说美国国会给予中国经济最惠国待遇来向中国政府传递建立稳定良好互动关系的意愿。这样的案例很多，这些现象说明了西方企业政治活动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尤其是国外一些在中国境内的跨国公司的政治参与以及社区营造行为对国内企业的经营理念产生了巨大冲击。

中国企业也积极投身到营造更有利的政治环境的活动中来。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的推进拓展了中国企业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渠道，它们逐渐意识到可以通过对政治环境进行管理来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利益。例如，中国吉利汽车通过政治战略“突破”产业政策的限制从而获得生产小轿车的资格（贺远琼等，2006）。同时，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发现仅凭自身个体力量已经难以和国外企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利益群体抗衡，它们构建更加有力的联盟来保护行业利益和个体利益。例如：温州烟具协会在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后，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诉，其中很重要的举措就是综合行业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进行表达，以争取政府支持。

但是随着企业政治实践的推动，特殊政治战术的运用被认为不再是组织获得成功的关键，为了赢得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制定长远政治战略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Yoffie et al, 1985）。企业政治活动看似不连贯、碎片化，但如果对企业审慎观察，仍然会发现

企业对外部政治环境反应的连贯性和内在动机的一致性, 其行为在长期具有一致性和指向性, 表现为一种可被归纳和高度概括的模式 (Pattern), 具有战略的整体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企业政治环境对于企业的深远意义, 很多企业都专门设置了公共事务部门来管理企业与政府以及其他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企业是否需要进行政治战略的投入, 这种投入会有回报吗? 企业在实践中遭遇的困惑需要理论上的解释。

综上所述, 随着政府对企业影响的日益广泛和相关利益群体力量的崛起, 企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 如何应对政治环境的变化, 如何通过对政治环境的管理, 维持现有地位或者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提高社会对企业的认同, 成为企业、政府、消费者、其他社会组织等相关利益群体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二) 理论背景

政治环境对企业是如此重要, 但研究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政治环境因素纳入战略分析框架。Porter (1980) 在他所构建的五力竞争理论模型中, 并没有直接考虑政府力量对企业竞争水平和行业获利性的影响, 即使在主流的 PEST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Technological) 环境分析中, 研究者也只是把政治环境视为和社会、技术等环境并列的一个静态的外生变量, 从而作为制定和选择市场战略的基础。随着政府对企业影响程度的加深, 企业对政治环境变化的反应方式也更加丰富和多元化。这些变化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在西方学者考察组织战略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 他们不仅考察了市场因素 (Bain, 1959; Porter, 1979, 1980, 1985) 的重要作用, 也分析了非市场因素 (DiMaggio et al, 1983; Abrahamson et al, 1994; Greenwood et al, 1996) 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 一些学者认为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主观的战略行为来抵御外界的变化并且影响环境, 进而改变环境以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Child, 1972; Barney,



1991; Lewin et al, 1999; Tan et al, 2003; Tan J et al, 2005)。这说明理论界已经考虑到环境在战略过程中的内生性，认识到企业政治战略的决策不仅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会反过来影响制度环境。

但是既往研究把企业改变政治环境的投入仅看作是企业成本或者是对企业的制度约束 (Pfeffer et al, 1978; DiMaggio et al, 1983; Scott, 2001)，而忽略了政治活动的收益和价值。随着政治环境重要性的日益凸现，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政治活动的决策也如市场决策一样，是可以以价值为导向的 (Oliver, 1991, 1996, 1997; Mahon, 1992; Baron, 1997; Shaffer et al, 2000)。Baron (1997) 提出企业非市场行为可以作为一种隔离机制来弥补竞争劣势。一些学者也持有相似观点，但是和 Baron (1997) 不同的是，Oliver, Mahon 和 Shaffer 把政治环境看作是内生变量。Oliver (1991, 1996, 1997) 指出企业可以通过管理外部环境（特别是非市场环境）来获得竞争优势。Mahon (1992) 认为企业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运用公司的资源，采取一致的行为来应对政治、文化和法律环境的变化，从而获得暂时的或者是持久的竞争优势。Shaffer 等 (2000) 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政治活动来扩大市场规模，减少竞争对手的威胁，增强与消费者和供应商的谈判力量，从而直接创造竞争优势。战略管理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企业如何获得竞争优势” (Rumelt, 1984; Porter, 1985)。这充分说明研究者已经非常重视政治环境对企业的重要意义，把其纳入战略分析的框架。政治战略被认为和市场战略具有相似的内涵，也是“一种在市场（或者非市场）环境中采取一致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改善经济绩效来创造价值” (Baron, 1997)。因此，学术界超越了传统的只把企业政治活动视为一种公共行为或者是成本约束的观点，从战略高度，试图以价值创造为线索来重新诠释企业政治活动。

虽然目前还未形成较为系统的企业政治战略理论，但是企业政治活动的研究却有较长的历史。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

行政力量的增强和对企业干预力度的加强,企业政治活动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吸引了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企业政治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各个学科从不同视角回答了企业政治活动的动因、类型和效果等问题,研究方法也日臻成熟。其中,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往往是从行业和集团层面分析特定政治活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但管理学视角则更多地从微观的企业个体层面关注企业采取政治活动的动机、类型和对绩效的影响(Shaffer, 1995)。企业政治战略研究就是在管理学对企业政治活动的探讨中逐渐发展和派生出来的一个研究问题。^[1]

目前,管理学对于企业政治战略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强调“向内看”,将企业内部资源看作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该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态能力理论在最近十年里得到迅猛发展(Wernerfelt, 1984; Rumelt, 1984; Barney, 1991; Teece et al, 1997; Eisenhardt et al, 2000; Zahra et al, 2002; Teece, 2007),为战略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企业更加注重能够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的识别、培育与获取。

但是仅强调“向内看”,忽略企业政治战略选择的背景和情境性,是不能做出正确选择的,社会学视角的制度理论强调的“向外看”观念为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制度理论在近二十年来已经有很大进展(Williamson, 1975; DiMaggio et al, 1983; North, 1990; Scott, 1987, 2008),战略管理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制度不只是外生变量或者控制变量(Oliver, 1997; Peng

[1] 绪论和文献综述中会多次出现“政治战略”、“政治行为”、“政治行动”等表达,因有关政治战略的系统研究还很少,以上提到的相关议题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观念、思路、方法和框架。为了在逻辑上统一,在绪论中,上述概念表达统摄在“企业政治活动”这一概念下,在第三章再进行概念的辨析。

et al, 1996), 而是直接解释企业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变量 (Peng et al, 2008)。

这两种理论视角以及分析范式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企业市场战略与竞争战略管理的研究之中, 同样也运用于企业政治战略管理的研究之中 (Masters et al, 1985; Ullmann, 1985; Grier et al, 1994; Rehbin et al, 1995; Dahon, 1995; Hay et al, 1998; Hansen et al, 2000; Schuler et al, 2002; Morck et al, 2005; Acemoglu, et al, 2007)。建立在资源基础观 (Resource-based View) 上的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个体特征对企业政治战略的影响, 但是无法诠释企业在同一个场域内战略决策的趋同性。制度基础观 (Institution-based View) 的引入可以解释企业对制度环境的服从和同构化现象, 但是一旦将研究焦点聚焦于个体企业的战略选择, 其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因此, 要全面揭示企业政治战略的内在运作机理, 研究就要尝试从多个层面、以多种方式整合两种理论视角。

综上所述, 企业政治战略问题引起了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兴趣, 运用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范式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已经成为战略管理研究方向。

二、问题的提出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企业政治战略主题以及相关主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和成果,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甚至实证检验。首先, 尽管国内外管理学学者从资源基础理论或制度理论等理论入手, 试图阐释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的影响因素和证明企业政治战略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的假设, 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如关于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企业政治战略决策以及实施相关行为的问题, 大量既往研究从资源基础观出发, 用个体组织特征进行解释 (Masters et al, 1985; Ullmann, 1985; Rehbein et al, 1995; Schuler,